

失去了威信的父亲

SHIQU LIAOWEI
XINDEFUQING

●唐克新



上

失去了威信的父亲

唐克新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叶旦桥

失去了诚信的父亲

唐克新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书号：10078·3871 定价：1.60元

目 录

失去了威信的父亲.....	(1)
思悠悠.....	(106)
没有找到钥匙的锁.....	(183)
“李天王”.....	(224)
一只螺丝的部位.....	(263)
选举.....	(291)

失去了威信的父亲

—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说起来又是颇为残忍的，所以，就理智上来说，我极愿把它从记忆中彻底抹去，永不再去提它；但从感情上来说，我却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就像赖掉了一笔死人的债务，虽然内心里暗暗庆幸（因为已死无对证了），却又时常有点惴惴不安，好像那死鬼的阴魂会随时来向我讨债似的。

既这般如鲠在喉，那我就索性把它彻底地吐一吐。

1979年的春天，对于我来说是个充满了阳光、温暖、激情和热泪的日子。饱尝了七年铁窗风味的我，终于又重新获得了自由和权利。当然，对于这一天的终于会到来，我原就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什么“现行反革命”，我这大半生倒是镇压过不少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如果说我也应该承认什么错误，也不过是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下发了点牢骚，而从今天的观点看来，那倒完全是正确的。然而，我却从来不敢想象得到如今这般优厚的补偿。七年的冤狱不仅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恢复了一切名誉，恢复了党籍和原有的

行政级别，还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请别见笑，就属于我个人的私有财产来说，我还从未敢想过这么大的数字。所以，当时我确实是有点吃惊和不安的。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不久，我又被任命为局的第二把手。并不是说我没有这种资格，我1949年进城后就一直在这个系统工作了将近十年，如果不是那场“大革命”，我现在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岗位上。然而，现在我已有十几年没有工作了，特别是身陷囹圄那七年间，完全是与世隔绝的；当我重新进入这个现实世界时，它早已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身，简直使我感到陌生了。

真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过，我这个“桃花源中人”尚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深知自己需要有一个对世情时务的了解和适应过程，否则还会出政治上的问题的；而像我这样年逾半百的人，在政治上可再也栽不起跟头了。因此，我正式请求领导上推迟宣布对我的任命，让我先到基层去蹲点一个时期再上任。当然，这个请求得到了领导上的赞赏和准许。

我所选择的蹲点单位，正是我解放初期工作了将近十年的那个工厂。有人告诉我：那个厂在“四人帮”时期是个“重灾”单位，搞得很乱，后来虽然经过清查，但至今仍是“阴阳怪气”的毫无起色。所以，人家劝我还是换一个厂，但我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记不得是哪一位外国诗人，好象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我几乎是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喜悦心情赶往这个工厂去的。它对于我来说，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现在，我却又要重新走进我的记忆中去。这是很富于诗意的，只可惜我不是个诗人。

我既没有要小车，也没有乘电车，而是迈着一双腿，安步当车。我知道步行的路程并不近，但我似乎有意在追寻自己过去的脚印和逝去的年代。啊，对了，那是个春末夏初的最佳时节。我和另外两位同我年龄相仿的战友，穿着一身粗土布军装，迈着一整整齐齐的大步，从市军管会步行了一小时来到这个厂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军代表的身份，宣布对这个吮吸工人血汗的官僚资本企业实行接管，宣布它从此归人民所有。我们原以为，我们的出现和将要宣布的这一决定，毫无疑义地会受到全体工人的热烈欢呼。不料，事情却完全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天晚上，我们在厂里那个足球场上搭起了讲台，拉起了照明灯，召开第一次职工大会。会议由本厂唯一的地下党员严老五主持。谁知，来的人却是零零落落，稀稀拉拉，直到八点多钟才到了个七八成。我心里实在有点不高兴。

严老五见我的脸色难看，便在台上拿腔拿调地对台下的群众教训起来：“工友们，今天是开大会欢迎我们的亲人解放军，欢迎我们厂的军代表，也是欢迎我们厂实行军管的大喜的日子。可是你们这样拖拖拉拉、散散漫漫的像个什么样子？哪有一点主人翁的样子！还有一些人，不听人话信鬼话，一点没有立场，相信反动分子和特务的谣言，对今天的会议三心二意……”

他似乎越训越来气，越讲越顺口，根本没有完的意思。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同群众见面，这样一上来就训人，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正想站起来打断他，台下却发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嘘声，接着，竟有人对着台上大声叫道：“严老虎

(严老五的绰号),你自己算什么东西?”

“投机分子!”台下又有人应和道,“摇身一变,接收大员,不要面孔,滚下去!”

这一切都接得那么紧,根本容不得台上插言。于是,台下很快就形成了一片“嗡嗡”的混乱声。当时,我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是血气方刚,觉得不能再不说话,不能再不表示给严老五以坚决的支持。虽然,我对他的那种做法并不同意。

“工友们,请大家静一静!”我走到话筒前大声而严厉地叫道。

大概,我那洪亮的嗓音、威严的气势,还有那一身土而且粗的黄军装都一起产生了效果,乱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一时都呆住了。

我大跨双腿,两手插腰,昂首挺胸,以严厉的目光对台下扫视了一眼,沉默片刻后,字字如掷铁块似地对台下说道:

“工友们,今天是我们工人阶级开始当家作主人的大喜日子,但是,有人是不舒服、不愉快的: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和他们的特务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工贼恶霸!现在,我代表军管会向这些人提出严重警告:今天,蒋家王朝的八百万大军都让我们消灭了,你们这些人必须老老实实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这样还可以回头是岸;如若你们还要继续与人民为敌,继续捣乱破坏,那么,你们就要被彻底消灭!”

我的话刚落音,严老五便忙接上嗓音更高地吼道:“大家听到了没有?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谁要是再敢出来捣乱,工友们就把它拉到上面来!”

我感到严老五的话很不得体,正想用什么话去纠正他,台

下那个人竟又肆无忌惮地愤怒叫起来：“你别狗仗人势，你吓不倒人。你是什么东西！”

面对这种猖狂的挑衅，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愤怒地猛拍一下面前的讲台说道：“我们不吓人，你是什么人？你敢跑出来吗！”

“上来就上来……”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也不顾一切地叫道。

但是，他终于没有上来。台下乱了一阵，很快又安静下来。看来，那家伙被人拉出去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严老五再次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时，整个会场上的照明突然熄灭了。有人切断了电源，把整个会场抛入了一片黑暗和混乱……

第一次职工大会就这样被破坏了。

我愤怒地对严老五说：“这里的反动势力竟猖狂到如此程度！这是件严重的反革命破坏事件，必须立即追查，尽速把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

严老五连连点头哈腰地说：“是啊，是啊，这里的工人思想太落后了，所以，反革命势力就特别猖狂……”

然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在台下骂严老五的人，后来不仅成为我们在这个厂最重要的依靠骨干，而且还成了我的挚友，一个著名的劳动模范。

这是位多么好的老工人。他耿直、真诚、忠贞不渝、无私无畏。一提起这个厂，我就会想起他来，在我的心目中，是完全把他同这个厂视为一体的。可以说，他是我对这一段逝去的年代的怀念中最感亲切、最可宝贵的部分；而我这次选定到

这个厂来蹲点，也可以说正是他在向我召唤。

然而，那已经是整整三十个春秋过去了。那时我还是个有点毛毛糙糙的小伙子，他也才三十出头；如今我已是个饱经沧桑、年逾半百的小老头，而从我被调到钢铁工业，最后同他分手算起，已有20年，这期间联系渐渐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后来我被囚入狱，彼此就完全断绝了音讯。

他现在究竟怎样了呢？在局里的时候，我怎么竟未听到有人提起他呢？也许他还是老样子？一个挂着许多空头衔的实干苦干的老工人。在我不很清楚的印象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经历很坎坷。但在那样一场动乱中，又有谁能够幸免于难呢？一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不是都被说成了假的吗？何况，他又是个决不随风摇摆而宁折不弯的人。对了，曾听人说过，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同20多位劳动模范一起写过一张大字报，那是保当时的市委的，很有影响。后来，这张大字报被造反派说成是“镇压造反派的檄文”。如此，他的处境能好得了吗？当然，在那个时候受点委屈也没什么了不起，那是不算数的。到今天不是就好了吗？对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工人、老模范，党的阳光肯定会照到他身上的。这是毫无问题的。

他比我大10岁，今年已是六十出头，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不过，像他这样有一身高超技术的老工人，又是1959年第一批提拔的工人工程师，一般来说是不大可能让他这么早就退休的；更何况，他还是这个厂的活字典，不论是厂内的人事关系还是地下的水火管线，他都了如指掌。少掉这样一个人，那确实会是工厂的一大损失的。

二

一切都同 20 年前差不多：两扇灰色的大铁门，上面的涂漆已经像破纸似的一块块剥落下来；那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厂内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叶稀疏地似乎并无多少长进；办公大楼前那口喷水池早已干涸见底，当中的喷头也没有了；池子周围的花坛中堆满着黄蜡蜡的新土，但既没有花也没有草，一看就知道它们也都曾一度遭劫。现在，人们似乎又打算把它按原样恢复起来。看着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感到有些凄凉。这个已经不知疲倦地运转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厂，恰如一头老黄牛，它如今每年创造的纯利润，仍能建造一个和它同样规模的新厂，而它自己，却变得越来越破败衰老了。

这只喷水池和它周围的花坛，正是阿隆师傅当年带着一批青年工人，利用废旧物资义务劳动搞起来的。它也曾有过自己的光辉年华。想当年它绿草如茵，繁花似锦，飞玉溅珠，鱼跃清底，差不多天天都拥来一批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围着它轻歌曼舞，摄影留念。如今，也许正是阿隆师傅又在张罗着把它恢复起来吧？想到这里，我更加有把握：很快就能见到阿隆师傅了。

当我兴匆匆地跨进厂党委办公室时，里面静悄悄的，只有一个胖胖的姑娘在全神贯注地打字。我觉得她明明知道我进来，却全然不加理睬。于是，我只得先开口了。

“同志，这里是党委办公室吗？”

“是的。”她只顾自己“咯嗒、咯嗒”的按着字键，头也不抬

地回答说。

“请问，曹书记在吗？”

“不在。”

“哪里去了？”

“在开党委会。”她仍然头也不抬地说。

“能通知一下……”

没等我说完，她就一口回绝说：“不行。”

当然，一定要马上叫他出来也不难，我只要立即亮出自己的来头就行了。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倒很想趁这机会先打听一下，或者先见一见阿隆师傅。

“同志，请问阿隆师傅在哪……”

她的手象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突然从字键上跳开，终于抬起头来对着我，用既是怀疑又是惊讶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这目光我是见得太多了），好象我问的不是一个著名的劳动模范，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罪行滔天的反革命。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又像那次被逮捕时一样，一时竟弄不清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恶梦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了。

“你是哪里来的？”

她对我研究了半晌，似乎终于得出了应有的结论（那当然是很不妙的），开始对我审问起来。

“我从局里来。”

我觉得她身上穿的竟是公安人员的制服。为了避免精神上陷入一种不可收拾的困境，我情不自禁地亮出了自己的来头。然而，已经有点晚了。

“局里来的？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她连我的这个来头也表示怀疑了。

我的手已经伸进口袋，介绍信就捏在手里，但我又猛然省悟到：这已经不是1973年，也不是1976年，我也已经不是“南冠之客”，而是一位即将上任的局领导干部，应当彻底清除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理。因此，捏着介绍信的那只手又松开了，并执意地问道：“同志，我是问你阿隆师傅在哪里。这难道也要介绍信吗？”

她纹丝不受影响，仍然用那种审判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这回却是带着明显的鄙夷。我准备着她扔出几句更难堪的言语来。可是，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又改变了主意，把她那“长波浪”一甩，吐出两个使我目瞪口呆的字来。

“死了。”

“啊！？”我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但我立即又怀疑起来：她是否在戏弄我呢？因此，又紧追一句问道：“你这是开玩笑，还是真话？”

她又对我睥睨一眼，用教训的口气说：“你这个人，年纪都这么一把了，这种话也是能开玩笑的么？”

不幸，看来这完全是事实了。啊，我简直有点眩晕了。

“那，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上个月。”

“什么病？”

“什么病也没有。是自己从楼上跳下去的。”

我又一次瞠目结舌了。他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自杀？”我终于又从惊愕中醒过来，问道。

“你这个人真是的，这还用得到问吗？”她以不屑的口气说。然后又对我诘问道，“喂，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她又重新想起对我的怀疑来了。我略一寻思，觉得这也难怪她：一个局机关的干部，对这样一位著名的劳动模范之死竟毫无所闻，这怎能不引起人家对你的怀疑？她的这种警惕性，是完全应当得到肯定的，至于她的态度，也就不值得过于计较了。因此，我忙主动作了些弥补。

“我是最近刚调到局里的。”

“你同马阿隆什么关系？”

“老朋友。”

“老朋友？那怎么连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想避开痛处她却偏往痛处戳。但她的怀疑是符合逻辑的，如果我照实告诉她，又将会引出她更多的审问。这些年来，我对审问实在听得够多的了。所以，便含混地答道：

“因为我们有好多年不联系了。——可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自杀的呢？”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喀嗒、喀嗒”地按了一阵字键，才冷冷地笑几声说：“一个人中极左的毒深到这种程度，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忍心打死。”

“你，你这是说的阿隆师傅？”我再一次惊讶地问。

“不是他，还有谁？”她停下按字键的手，对我看了一眼又说，“恐怕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

一时间，我竟再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回，她却出人意外地又对我解释道：

“这几年来，亲爷娘杀掉亲生子的事也出过好几件，可人

家都是因为儿子是流氓阿飞，或许逆不孝，虐待父母，公安局又管不到……而马阿隆的儿子呢？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偷不抢；前年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了个大学生，到现在30岁了，连个对象也顾不上找……”

她说到这里，突然又中断了，摇了摇头，但不知怎么注意力忽然又转到了我的身上。

“喂，你刚才不是要找我们党委书记吗？你究竟是来找啥人的？”

这姑娘的心思真活，简直使我有猝不及防。事已至此，看来我不得不亮相了。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她递上了介绍信。

“哦，你就是宫崇光同志！”她看着介绍信，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我叫小苏。我们早听说你要来了——不过，曹书记说你要下星期才来。怎么今天就来了？”

她说得那样自如，好像刚才那场硝烟刺鼻的对话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当然，我也乐得随人应和了。

“这里原是我的老‘娘家’呢，所以，我想早些来看看老朋友。”

“哦，对了！听说你是我们厂解放后第一任党委书记，1959年就离开的。是吗？”现在，她显得更加活泼了，“不过，那时我还在幼儿园哩。所以，现在你认识的人大概也不多了。”

“是啊，这20多年的变化也实在太大了。不过，像阿隆师傅这样的变化，我却万万想不到的。他今年刚过60岁，如果——”

我的话头不知不觉地又回到那个令人不怎么愉快的老题

上去了，这也许会使人重新陷入已经摆脱的窘境中去，所以我便立即刹住了。

看上去，她是个很能领会别人心意的姑娘，对我领情地一笑，便立即岔开去说：“哦，我还没去告诉曹书记呢。——你请沙发上坐一会，我这就去……”她说，就灵活地旋转身走出去了。

我埋身在一只棕色人造革单人沙发里，深深地松了口气。现在，我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安静时间，来整理一下这位脑子活络的姑娘所传递给我的信息了。

一个忠厚、正直的老工人、老模范；一个年逾花甲的老父亲，竟打死了（我还不知道是怎样打死的）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就我记忆所及，这孩子童年时代是那样聪明可爱，以善于领会大人的心意、懂事善言而特别博得大人喜欢和父亲的钟爱。后来呢？照这位姑娘的介绍，那也是个小伙子：他作风正派，生活俭朴，上进好学。可是，却让自己的生身父亲——天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正常的逻辑把这些得到的信息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做出一个合乎理性的结论来。那么，是不是那位阿隆老头患了精神失常症，抑或晚年堕落了？不，这决不可能！以往，我与他相处10年之久，从彼此对立到建立起真挚的阶级友情，何曾见过他有过半点虚伪装假？相反，随着时日和友谊的俱增，我倒越来越为他担心：过于耿直和重感情，可能会为他带来严重后果。如果说，他这样的人也还有什么要怀疑，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也许，我这话说得太绝对化了些，但我是坚信自己的判断的。

三

我一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而我同他结识的方式也是非常特殊的。

球场上的第一次职工大会被破坏以后，我们一直在侦查那个破坏大会的“反革命分子”。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总是认为：那个切断会场照明电源的人就是那个在台下辱骂严老五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台下有不少人是知道这个坏家伙是谁的，但却没一个人出面告发检举他，所以我们也一直没把他查出来。仅此一点，我深深感到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之复杂。

当时，在我来这个厂之前，市军管会有关领导就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在这个厂的反动势力非常强，致使我们地下党的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又由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得敌人的破坏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到解放前夕，这个厂的地下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直到我们进城以后，才有个叫严老五的地下党员和我们接上了关系。因此他对我们来说，简直成了件活宝！何况，过去地下党还派他混进当地的恶霸流氓、本厂的工贼马金标的安徽帮里去摸情况。所以，他对本厂的各派明暗反动势力都比较了解。那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地下党的帮助啊！否则简直是两眼一抹黑。这样，不久我们就让他担任了本厂的保卫科长。

那时，社会秩序还相当的不安定，暗藏的蒋帮特务到处活动，天天在散布那些蛊惑人心的反革命谣言：一会说国民党要回来吃粽子，一会又说蒋介石要回来吃月饼；一会又说第三次